

第一章 多元学科视野中的 印刷媒介史研究

长期以来，由发明和科技进步所带给我们的不少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事物，它们的历史渊源、在文明史中的意义却常常被人们所忽视，或者是语焉不详。的确，在进步主义的历史观中，人类通过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实践，会源源不断地出现发明和各种别的形式科学技术的进步。所有的科技发明和发现都或多或少地改变了人类生活的状况，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有几项发明和发现对人类文明史来说却是关键性的，当然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印刷术便是极大地改变人类文明史进程的重要发明。培根在欧洲活字印刷术发明了大约一个半世纪以后就格言式地宣称“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这些发明的力量、效能和后果，这几点是再明显不过表现在古人所不知，较近才发现，而起源却还暧昧不彰的三种发明上，那就是印刷术、火药和磁石，因为这三大发明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状态”。^①可惜的是，这样简单的一句话，几乎带过了就这些发明对世界所产生巨大影响的深入探究。火药和指南针所带来的改变因涉及的领域比较局限，因而也较为简单，处在常人想象所及的范围之内。而印刷术带来的却是人类信息存储和传播方式的深刻变革，这种变革逐渐扩展到几乎所有民众的知识获得与日常的生活方式之中。这一过程以及所涉及的人类历史进程的方方面面都似乎漫漫无际。本书就试图对印刷术及其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影响作一些尝试性的研究，力图在人们关于该问题的常识之外作出学术性的梳理和总结。

印刷媒介(Printing Media)这一概念来自于传播学。 Media 是 Medium 的复数形式。 Medium 一词源于拉丁语 medius ,意为中间 ,其形容词意为中间的、中等的、适中的。它的名词的意义除了中等、中庸、适中以外 ,引申义有介质、传导体、手段、工具、方法(生物的)生活环境 ,以及通常用作复数形式的传播媒介等义项。媒介是使传播实现的载体和途径 ,在大众传播中即为大众媒介(mass media) ,它使得信息可以传达广泛的人群。①广义地说 ,媒介是一种能够使传播得以发生的中介(intermediate agency) ,说话、写作、手势、表情、服饰、动作、舞蹈等等都可以被视为传播的媒介。但在实际应用中该词的词义在衰减 ,被更多的从大众传播的技术角度方面进行了界定 ,用来单指实现大众传播的技术形式 ,有时也用来表示大众传播的方式和手段。②在本书的研究中 ,媒介一词的意义即为大众传播的方式。从这一意义上来说 ,印刷媒介包含了通过印刷物进行信息传播的整个过程。

一、史学中的印刷媒介史研究

由来已久的印刷技术史、出版史、书目学、图书馆学、文学史、新闻史是关于印刷媒介史这一主题的最早研究方式。它们的研究 ,发掘整理了最基础性的史料。但是 ,这些领域的研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的重点是 ,印刷出版的产品及其生产者。如印刷技术发展、版本考订、重要著作或报刊的出版等 ,这些都是它们老生常谈的研究领域和思路。诸多以作品为主要线索的出版史 ,尽管也总是要或多或少涉及一些著作的历史影响和社会意义 ,但是更多的是就著作本身来说

① The Oxford Dictionary , vol. IX , p. 439, 542.

② O' sullivan eds. , Key Concepts in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Studies , 2nd edition , 1994 , London & New York p. 176.

的，缺乏对著作传播整体过程的关注，进而导致对影响和意义概括的不精确。而且，这类研究的视线也很少涉及印刷技术或印刷产品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这两方面的局限注定了它们的基础性地位。因此可以说，在史学界大规模介入印刷媒介史的研究之前，该领域的研究尚属十分典型的行业史范畴。随着研究的深入，各种史料的发掘和整理将越来越深入和广博，其研究者当然也将超出原先的范围。

在传统史学研究的视野中，印刷媒介起的作用仅仅是为研究者提供史料和对其历史作用进行的简单评估。史学研究者无一能够逾越自印刷术发明以来的浩如烟海的、各种用印刷手段记载与流传下来的各种形态的史料。不少史学研究者因为对印刷这一历史现象习以为常而无甚感受，有的史学研究者虽把印刷术的出现视为文明史上划时代的标记，然而对其历史意义的整体评估总显得十分粗概，甚至不屑一顾。布克哈特在其名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对文艺复兴时期所出现并开始在西欧广为传播的印刷术，只是在《古代著作》一章中有简单的提及，其深远的历史性意义则几乎没有论述。^①

印刷媒介史研究的勃兴得益于社会史的发展，年鉴学派的史学家成为这一领域最早的开创者之一。年鉴学派两鼻祖之一的吕西安·费弗尔 (L. Febvre) 1957 年逝世后，在马丁 (H.-J. Martin) 的努力下著名的《书的来临》于次年出版了。^② 该书的研究范围覆盖了欧洲整整三个半世纪的印刷书籍的历史，特别重要的是，它还专门论述了印刷书籍在这段历史进程中的影响和意义。这部被收入“人类的演进”(Evolutions de L'Humanite) 丛书的著作虽然有人认为是马丁做了其中的大

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 189 - 198 页，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

^② Lucien Febvre, & Henri-Jean Martin, *L'apparition du Livre*. Paris, 1958. English version, *The Coming of the book: The Impact of Printing 1450 - 1800*, tr. David Gerard, London, 1976. 遗憾的是，国内大多数对年鉴学派的介绍和研究中都未提及该著作。

部分工作，但书中无不闪烁着第一代年鉴史学家的思想方法。费弗尔曾对文明下过这样的定义，“文明是一种合力的结果，即物质和精神的合力，知识与宗教的合力。这些合力在特定的时期，特定的社会对人们的思想意识发挥着作用”。^①无疑，印刷出版物最能集中体现各自所诞生时代的这种“合力”。印刷物可以成为透视普通人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的窗口，其本身也就成了年鉴学派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的重要范畴了。马丁在十年之后出版了《17世纪巴黎的书籍、权力和社会（1598—1701）》。^②该书的内容超出了书名所界定的范围，因此有人把它说成是合著的续编。但是马丁在该书中主要论述的是法国封建专制王朝鼎盛时期巴黎的社会文化状况，从覆盖的范围来说显然不是前者严格意义上的续编。不过，从被认为是前者续编的评价中也足见该著作的水平。这两部著作应该被视为年鉴学派在这一领域内最早的一些贡献，他们的筚路蓝缕引导了年鉴学派众多学者开始对印刷媒介的历史研究，进而推动了在欧美学术界出现的对印刷媒介的研究热潮。

对社会史、文化史、心态史的研究势必要求研究者“向下看”。对大众文化的研究为新史学所广泛重视。如德吕木（J. Delumeau）、芒德鲁（R. Mandrou）等史学家都试图从书籍的生产与传播的过程中透视大众文化，反映与精英文化的区别。芒德鲁在探索近代法国“集体心理”变化时，就有意识地从印刷书籍的生产和流通以及反馈中着手研究。在纪念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之际，被新闻媒介称之为“二百周年之王”的孚雷（F. Furet），他作为年鉴学派史学家的早期研究竟然也以印刷媒介史为重要的主题，他在《读与写》和《书籍与社会》^③这两

① Lucien Febvre, *Pour une Histoire à Part Entière*, Paris, 1962, p. 529.

② Henri-Jean Martin, *Livre Pouvoirs et Société à Paris au XVII^e Siècle 1598 - 1701*, 2vols, Paris, 1969.

③ Francois Furet, *Livre et Société*, 2vols, Paris & Hague, 1965—1970; Furet, & J. Ozouf *Lire et Ecrire*, Paris, 1977.

部著作中，与合作者充分运用了数理统计，对各个地区各个社会阶层的识字率、书名、作者、书评、读者、出版者、学术机构的社会构成以及各类术语概念的出现等诸多项目的“结构性数字资料”或“非结构性数字资料”^①进行了数理统计分析。这些研究较为精确地揭示出某些社会文化发展的趋势。可以十分肯定地说，孚雷后来在大革命史学中提出的对进步主义史学传统的巨大挑战，正是基于这些结合社会文化发展的计量方式的研究，这是他认识大革命爆发基础的重要来源。而对大革命文化起源上的研究，恰恰十分容易得出关于大革命的一些不同于进步主义史学传统的认识，如“精英革命论”。

夏蒂埃（R. Chartier）与罗歇（D. Roche）是当前年鉴派学者在印刷媒介史研究领域中的代表人物。有人认为他们的研究是心态史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特别注重从阅读史的角度去考察印刷媒介的历史效用。毫无疑问，阅读史是反映特定人群心态的极好材料。年鉴派学者的这些研究至今领导着国际近代印刷媒介史研究的潮流。

除法国之外，历史学领域中进行关于印刷媒介历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英、美、德三国。1955年，德国的斯坦伯格（S. H. Steinberg）出版了被视为雅俗共赏的印刷史著作《印刷五百年》。他认为“印刷史是整个文明史不可或缺的部分”。^②这部著作作用相对不算长的篇幅覆盖了欧洲整整五个世纪的印刷史，没能达到年鉴派史学家在这一问题上所涉及的广度和深度，尤其是它在叙及19世纪以后部分时显得更为单薄。但是它在论述古腾堡印刷术发明一个世纪以内的时段里，所引用的不少史料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屡屡被后人所引用。德国人赫尔施（R. Hirsch）在研究古腾堡印刷术出现后一个世纪的相关

孚雷：《历史学中的计量》载勒高夫等主编：《新史学》第120、12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

② S. H. Steinberg, *Five Hundred Years of Printing*, 2nd edition, Baltimore, 1961, p. 11.

历史时 则从“ 印刷、销售和阅读 ”三方面切入进行研究。^①有意思的是，这两部代表德国学者关于印刷媒介史研究的著作，其出彩之处或研究重点都在 16 世纪中叶之前，而德国又是欧洲印刷术的故乡，这两者之间多少有些微妙的联系了。

英国学者阿尔提克（ R.D. Altick）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就出版了专门研究英国大众阅读历史的著作《英国的大众读者》。作者自称这部两卷本的著作是研究 19 世纪英国大众阅读的社会史，“ 尝试从历史学家的观点来研究阅读在工业化和日益民主化社会中的地位 ”。^②不过，其中有很大的篇幅回顾了印刷术从 1476 年传入英国以来到 1800 年的相关历史。阿尔提克实际上关注的是印刷物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因此在印刷媒介历史研究的进程中，这一著作具有开创性的意义。瓦特（ T. Watt）的《廉价印刷物和大众虔行，1550—1640》试图通过对印刷媒介的研究来考察新教对英国人的阅读心态以及各种思想在社会中传播的影响。她认为通过游吟诗人和各种商贩，印刷文化可以到达英国的各个角落。即便是穷人或文盲，也可以在各种场合看到宗教题材的印刷图像而受到了印刷物的影响。因此这一时期的廉价印刷物是一种社会粘合工具，它把越来越多的人带入公众阅读。各种思想、故事、形象和价值观通过多个层面进入了英国社会。同时得出宗教改革并没有使社会迅速从口语和形象化的文化转向以印刷为主体的文化，无论大众还是知识阶层，口头与形象化模式的理解和表达依旧处于中心地位。^③

在美国，研究者一定程度上承认“ 新的 ”印刷媒介史的研究是从法国年鉴学派处引进的。^④美国传统的印刷媒介史的研究只是印刷

① R. Hirsch, *Printing Selling and Reading 1450—1550*, Wiesbaden, 1967.

② R.D. Altick, *The English Common Reader: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Mass Reading Public 1800—1900*, Chicago & London, 1957, p.1.

③ T. Watt, *Cheap Print and Popular Piety*, Cambridge, 1991.

④ 卡伦·温克勒：《对印刷文字的研究热潮》，《交流》1994 年第 2 期。

史学者和历史文献学者的领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目前印刷媒介史的研究中心在美国。1991年，美国成立了“作者、读书与出版史学会”(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Authorship, Reading and Publishing)。剑桥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出版社等出版机构系统地出版这类研究的丛书；美国文物工作者协会(American Antiquarian Society)编纂了一部多卷本的美国书籍文化史；宾夕法尼亚大学还新建立了书籍史研究中心等等。他们不管所研究的印刷物的形态，而把这一系列的研究统称为“书史”。

美国印刷媒介史的研究者众多，来自历史学、文学、图书馆学、文献学以及各种与印刷媒介相关的行业史领域。其中爱森斯坦(E. L. Eisenstein)和达恩顿(R. Darnton)是两位不得不提到的史学家。爱森斯坦在她的名著《作为一种变革动力的印刷出版》中说明了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原因。她“在从事了几十年西欧史的研究和教学之后，不满于现所流行的近代早期有关政治革命和心智(intellectual)革命的解释”，^①于是开始思考15世纪传播方式变迁以后的历史后果。但是她当时竟然“找不到一本书，或者哪怕是一篇可观的文章论述15世纪传播变革所带来的历史后果”。^②她把全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集中论述西欧从手抄到印刷的变革，并力图拟列出这次传播革命的主要特征；第二部分主要论述印刷出版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科学革命中的历史作用。她颇为自信地宣称，第一部分的内容是除书籍史专家以外大多数历史学家所不熟悉的领域；尽管后一部分所涉及的历史过程为许多史学家所熟悉，但她试图从印刷术所带来的传播革命的新角度进行研究，并且承认这部研究范围覆盖西欧印刷术出现两个世纪以后历史的著作是属于论著，而不是档案研究。的确，一般的历史学家不可能掌握14—16世纪语言背景等极其复杂的第

① E. L. Eisenstein, *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 New York, 1979, pp. X ~ XI.

② Ibid, p. XI.

一手材料。爱森斯坦的这一著作在美国书籍史研究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有意义的是，达恩顿的史学研究重点和爱森斯坦一样也是集中在法国。达恩顿以印刷媒介史的研究为切入点，着重透视法国从旧制度到大革命的社会文化变迁。他在 1984 年出版的著名的《猫的大屠杀以及法国文化史中的其他事件》一书中，在对印刷媒介的研究中引进了文学批评和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方法，把“文本”“符号”“语境”等概念应用到文化史的研究中，倡导所谓的“历史学的人类学模式”(anthropological mode of history)。他对在年鉴传统影响下的法国的文化史研究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尤其是“法国人试图通过计量大众的死亡、对炼狱的描述、书名、学院里的讲演、财产目录中的家具、治安记录中的犯罪情况、遗嘱中对圣母玛利亚的祈祷，以及在教堂中向圣徒所赞助蜡烛的磅数的方式，来测定大众的态度”。他认为“文化对象”(cultural objects)与经济史、人口统计史研究所要求的连续化的资料有着不同的性质，因为它们“不是由历史学家所制造的，而是由他们所研究的对象所制造的。它们滋长意义，它们需要被解读而不是被计算”。文化也不能被视为肖努(P. Chaunu)所说的三层结构(经济、社会、文化)中的一层，因为所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具有文化性质，哪怕是那些被我们限制为“经济的”或“社会的”。通过强调计量和他们“对社会交往中符号因素的低估”，法国史学家在最近的分析中忘记了什么是本质。^①这种对计量的过分依赖和对社会交往中符号因素的忽视，的确可能使得社会文化史的研究陷入尴尬的境地。达恩顿在 1989 年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纪念活动中与纽约公共图书馆合作举办了“印刷中的革命：法国，1789”的展览，把革命的历史通过尘封的印刷物传递给广大观众，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同时也向大

^① R. Darnto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and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 1984, pp. 258 - 260.

众传达了许多印刷媒介史研究的信息。他还与法国的年鉴派史学家罗歇合作编辑出版了《印刷中的革命：_____年的法国出版》。

正是由于印刷媒介史逐渐纳入了历史学的视野，一些书目学家、图书馆员、经营善本的商人等，都为该领域的研究作出了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曾经担任过法国国家图书馆馆长的著名年鉴派史学家勒胡瓦拉杜里_____在_____年于北京作的一次学术演讲中透露，巴黎国立图书馆已整理出了六百万张卡片和六百万张摘录，用这些卡片可以研究该馆各类馆藏书名中所包含的九千万个词。无疑，这种大规模的基础工作为近代印刷媒介的研究提供了极好的史料基础，特别是满足了年鉴传统中计量研究的要求。

二、传播学视野中的印刷媒介

传播学是近一个世纪以来在欧美发展起来的一门显学。传播学者很容易发现，在无线电之前，印刷媒介是惟一历时近五个世纪的大众传播媒介。因此，用传播学的方法研究印刷媒介在文明史中的地位势所必然。上面所提到的历史学者在对近代印刷媒介历史的研究中，其实已经引进和借鉴了不少传播学的概念和模式，比如“媒介”、“受众”等概念，以及印刷媒介的生产、流通和影响的过程也是借鉴了传播的模式。

美国的传播学是从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学科分化出来的。它深受实用主义和美国社会体制的影响而形成注重现实研究的学术传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属于行为科学。在_____世纪_____年代初，传播学者批评美国的新闻史研究总是把新闻史写成是一种线性发展和

进化的过程，是一系列受时间限制的事件，不关注原则和实践之间的差异和距离。^①有的学者还就当代传媒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②但在近代具体社会历史中有关印刷传播的微观研究尚十分欠缺。这不仅因为近代传播有着比印刷传播更广泛的研究范围，而且该类研究必需具备的多学科背景常常使得研究者在概念上产生混淆，在理论方法上也感到无所适从。然而，对近代传播的重视能给传统史学拓展新的视野，并对历史发展的理解更为丰富。比如通过对肯塔基的开拓先驱者们 1769—1792 年传播状况的研究，传播学者敏锐地指出，特纳的新边疆理论中缺少了传播这一极其重要的要素，正是传播把西进的每一个社区与原先的系统联结在一起。^③

欧洲的传播学学派众多，主要有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文化学派（伯明翰学派）、政治经济学派、独霸理论学派和结构功能学派等等。总的说来它们受思辨传统的影响十分深厚，与美国的实用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其中最具有影响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传播研究是其文化批判的重要内容，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他们在分析垄断资本在资本主义大国取得成功而没有发生马克思所预言的革命性社会变革时，认为大众传播所带来的普遍的、商业化的大众文化是干预经济变革的重要因素。就传播历史本身的研究而言，他们理所当然地注重大众文化大规模发展之后的历史，尤其是电子媒介出现以后的传播历史。

同样属于传播学范畴，但偏重于社会学和心理学角度对近代印刷媒介的研究则显得比较具体。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研究者是富有

① J. D. Steven & H. D. Garcia, *Communication History*, California, 1980, p. 40.

② 美国著名的传播学家施拉姆（W. Schramm）1962 年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委托，撰写了《大众传播媒介与国家发展》（W. Schramm, *Mass Media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Stanford & UNESCO, 1964）一书，以考察大众传播媒介在促进经济和社会进步中所起的作用。

③ J. D. Steven & H. D. Garcia, *Communication History*, California, 1980, p. 71.

传奇色彩的麦克卢汉（M. McLuhan）。这位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其理论一度风靡北美的学者始终不懈地强调，媒介本身的特征直接影响到它们所参与塑造的社会关系的性质，即“媒介即信息”（Media is message），那么近代印刷媒介这一划时代的革命性传播媒介自然影响了近代社会关系的性质，大到政治体系，小到人际关系，无不被打上了烙印。麦克卢汉的另外一个重要观点为，媒介是人体感官的延伸。因而不同的媒介就会强调不同的感官，从而影响人们的思维习惯和认知方式。印刷媒介就迫使人们运用线性的、因果关系的理性思维方式来组织视觉经验。这种思维习惯和认知方式至今依旧存在于几乎所有的识字人口之中。麦克卢汉宣称他的写作要打破这种长期以来的思维定势，因而其著作经常被后人诟病为缺少严格科学性的随想。爱森斯坦曾把他就欧洲印刷术发明的影响的论述称为“神喻式的解释”。^①虽然他的像罗马式蜡烛一样散发的天才思想似乎很不符合学术规范，但仍对整个传播学研究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类似的研究还有汤普森（J. B. Thompson），他专门探讨媒介与社会现代化过程之间的关系，其中还把触角伸向更为细微的个人对印刷媒介的体验，以及媒介在人的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②

三、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研究中的印刷媒介

在对历史的整体性思考，特别是对世界近现代史的宏观考察中，思想家对近代印刷媒介给予了格外的重视。西方进步史观的重要奠基者，曾有法国大革命“擎炬人”之称的启蒙哲学家孔多塞，就把欧洲

① E. L. Eisenstein, *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 P. XI.

② J. B. Thompson, *The Media and Modernity: A Social Theory of the media*, Cambridge, 1995

印刷术的发明作为历史进步的阶段性标志。^①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的理论中，他特别强调被构成“世界三”的，无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客观思想内容的重要性。他曾乐观地认为，即使人类的文明突然间被毁灭了，只要有保存“世界三”的图书馆的存在，就可以得到迅速的重建。在他看来，各种客观思想内容、技术和艺术以及社会制度都可以因为书写和书籍的发明而被存储。波普尔晚年的一次演讲中曾满怀激情地说：“我们的文明是书籍的文明：它的传统和它的本源，它的严格性和它的理智责任感，它的空前想象力和它的创造力，它对自由的理解和对自由的关注——这一切都以我们对书籍的热爱为基础，愿时尚、传媒和电脑永远不会破坏和松弛个人对书籍的这种亲切的依恋’。^②

研究现代社会起源及特征的思想家们，一般从以下几方面来强调近代印刷媒介的作用。

其一，在近代以来形成的社会结构中，介于国家和社会之间进行调节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哈贝马斯(J. Habermas)就认为，向所有公民开放以形成公共意见的公共领域，必须可以自由地集合和组合，可以自由地表达和公开他们的意见。这也就必然需要一定传播和影响的手段，而近代的印刷媒介无疑担当了这一功能，并在公共领域的形成和发展中起了极其不可或缺的作用。哈贝马斯认为“公共”的意义来自两方面，一方面“私有化的经济活动必须以依靠公众指导和监督而不断扩大的商品交换为准绳，其经济基础在自己的家庭范围之外”，因而是第一次带有了公共性；另一方面，随着商品交换而发展起来的信息交换，即印刷媒介发展而

孔多塞把人类社会的历史分成十个时代，其中第七个时代是“从科学的最初进步下迄印刷术的发明”；第八个时代是“从印刷术的发明下迄科学和哲学挣脱了权威的束缚时期”；第九个时代是“从笛卡尔下迄法兰西共和国的形成”；第十个时代是“人类精神未来的进步”。见《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三联书店 1998 年版。

② 波普尔：《通过知识获得解放》第 162 页，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1996 年版。

带来的一种非政治形式的文学公共领域；“从文学公共领域中产生出来的。以公众舆论为媒介对国家和社会的需求加以调节”的政治公共领域随之也出现了。而且，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向国家的大众民主中的公共领域的转型，“可以从公共领域最典型的机制——报刊——的转型文献中看得清清楚楚”。因为随着印刷媒介的扩散，尤其是19世纪大众文化消费的崛起和政党报刊向大众商业报刊的过渡，公共的界域超出了资产阶级的范围。^①

其二，由于传播媒介在知识的传承、创新方面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因而吉登斯（A. Giddens）在对社会构成的考察中，特别重视信息存储在社会资源配置和社会发展中的意义。^②吉登斯认为：“从早期现代国家以及其他先行的现代性制度的兴起来说，印刷是主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因为现代制度的发展和扩张离不开人类知识和经验传承的革命性发展，而近代印刷媒介恰恰符合了这一要求。他所总结的现代性的三方面动力：时空分离（跨越广阔的时间与空间领域的社会关系的联合，并一直到包括全球体系的状况）、抽离化机制（由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所组成，它使得互动脱离了场所的特殊性）、制度反思性（定期地把知识应用到社会生活的情境上，并把这作为制度组织和转型中的一种建构要素），即是以知识的制度与机制、象征性标志为其主要因素，而它们都与传播媒介紧密相关。^③

其三，有关近代民族主义的研究也是近时期国际思想界的热点问题。近代民族主义形成的原因远不止是我们所习以为常的民族概念中所谓的共同的社会经济基础。安德森（B. Anderson）在他的关于民族主义研究的杰作中把民族性概括为“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他认为近代民族意识的起源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印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18、35、219页，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② 吉登斯：《社会的构成》三联书店1998年版。

③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第27、22页，三联书店1998年版。

刷这种新的传播技术和人类语言多样性的宿命这三者之间的互动而形成的。其中作为商品的印刷成为促进民族意识产生的关键，他将之特称为“印刷——资本主义”(print-capitalism)。它们在拉丁语之下和地方口语之上创造了一种统一的交换和传播领域，进而形成世俗的、特定的却又不甚明显的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的胚胎；印刷——资本主义产生了一种新的固定的语言形式，这在长期的发展中有助于建立对民族思想来说具有中心意义的关于古代的形象；印刷——资本主义还产生了一种与以往官方行政所用的本地语言不同的权力语言。

在传统的以政治为中心的史学研究中，人们一般把印刷媒介当作一种在近代社会进程中起进步作用的因素和标志。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印刷媒介对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等历史运动的作用；在早期资产阶级革命中的表现；以及作为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如何争得言论与出版自由的思想与实践的进程，尤其是有关言论和出版自由思想的发展）。在美国，人们习惯上把探讨大众传播媒介与政府等各种干预势力之间关系的各种理论称之为媒介哲学（media philosophy）。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赛伯特 F. Siebert）、彼德森 T. Peterson）和施拉姆三位学者合作，为美国全国教会委员会作了大众传播媒介的社会责任理论的研究，撰写了由四篇论文组成的著作《报刊的四种理论》。他们分别从集权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责任理论和苏联的共产主义理论四种媒介哲学出发，研究社会制度与大众传播媒介的真正关系。他们的研究最终证明，不同传播媒介体系之间的差异，实质上是一种哲学上的差异。因为不同的传播媒介体系基于特定社会制度所固有的某些基本信念和假设，即人的本质、社会和国家

① B.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1983.

的性质、人与国家的关系、知识和真理的本质等。^① 该著作是对西方媒介哲学的第一次系统总结，具有某种经典意义，足够用来区别不同的媒介体系。后来所增加的发展理论和民主参与理论并不能对应一种独立完整的大众媒介体系，而只是成为理论争论的一部分并影响当前媒介的政策和实践。^② 这四种理论是各种政治制度的不同发展阶段所采用的相应的大众传播模式，从此意义上来说，近代印刷媒介的历史，就是集权主义和自由主义媒介模式的历史，15—18世纪正是从集权主义的传播理论和实践向自由主义的传播理论和实践过渡的最关键时期。阿特休尔（J. H. Altschull）还对在美国新闻界留下了不可磨灭影响的，从17世纪弥尔顿到20世纪下半叶的麦克卢汉的传播思想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其中，以印刷媒介为绝对主要的媒介时期所产生的思想占据了他所涉及的思想的三分之二。^③

在阅读史的研究热潮中可以进一步看见，印刷媒介史这一大领域研究中的多学科背景。最早的文献书籍学的研究是为了出版权威和正确的文本，关注的只是文献的物理形态，漠视读者的存在。这种情况在英语国家和中国的学术传统中尤为突出。法国的书史研究更热衷于通过大规模的如对书目、销售和出借记录等原始档案材料的统计，来试图重建书籍的流通过程，了解不同群体中书籍的拥有情况，以及书籍对社会心态的影响。^④ 法国的传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英语国家的印刷媒介史研究，霍尔（D. D. Hall）1983年在美国文物协会的一次演讲中，指出了书史和传统的印刷史的区别：书史是持续地把一些孤立静止的信息转化为社会变迁过程的证据；书史关注读者和

① F. Siebert, T. Peterson, & W. Chramm, *Four Theories of Press* Urbana, 1956. 中译本,《报刊的四种理论》,新华出版社 1980年版

② D. McQuail,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An Introduction*, 2nd edition, London, 1987, p. 111.

③ J. H. Altschull. *From Milton to McLuhan: The Ideas Behind American Journalism*, New York & London, 1990.

④ R. Chartier, *The Order of Books*, Cambridge, 1994.

阅读；书史关注通俗文化；书史还需把书目学家的分析与文本本身结合起来。^①1993 年霍尔在另一篇论文中把美国的阅读史研究分为两大类，其一，融合印刷出版史与社会文化史，以试图构建习惯上所称之为读者的群体文化消费模式，并通过对读者的研究，重新估价通俗和大众文化；其二，主要是文学研究者，他们关注的是作者的创作活动和解释学的解释，倾向于把阅读和写作视为揭示社会的控制、颠覆和反抗状态。霍尔认为前者的历史学模式和后者的文学批评模式之间存在着较大的隔阂。^②

的确，在关于近代印刷媒介的已有研究成果中，可以十分清晰地看见多学科的介入。20 世纪下半叶哲学和文化批评的发展在该领域的研究中得到了明显的体现。因而，从阿多诺（Th. Adorno）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评、德里达（J. Derrida）的解构和文本分析、福柯（M. Foucault）的话语权力与知识考古学、布尔迪厄（P. Bourdieu）的文化资本等等也都被不少研究者或作为理论，或作为方法而广为应用。如此丰富的学术资源表明了该领域研究的前沿性。但人们不无担心，研究者来自不同的学科背景，他们从各自的角度研究印刷媒介的历史使得彼此的交流有着隔行如隔山的感觉。“理论与经验主义”、“历史研究与文学批评”是该领域目前最大的分歧。这些内容能否锤炼成一个整体，从而真正组建成一门新的系统学科，成为此类研究面临的关键问题。同样，也有人对其是否有必要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提出质疑。然而无论如何，关于印刷媒介史的研究已经彻底摆脱了行业史的研究模式，由于各种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学术资源源源不断地汇入，它已日益整合成为一个有其相对固定的学术规范

① David D. Hall, *On Native Ground*, in *Cultures of Printing: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Massachusetts, 1996.

② David D. Hall, *Reads and Reading in America: Historical and Critical Perspective*, in *Cultures of Printing: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Massachusetts, 1996.

和理论方法的研究领域，而且正是其在多学科的边沿性而更显价值不菲。

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正日益把人类社会带入“信息化”的崭新历史阶段。尽管“信息化”本身依旧没有十分统一的概念界定，但是对这一时代潮流的研究方兴未艾。研究者更多的是从经验的角度展望所谓的“信息社会”，并为之健康发展作参考研究。无论它是属于未来学范畴的还是属于现实问题的研究，无可回避的基础便是对信息传播的历史考察。因此，关于印刷媒介历史的研究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

本书将研究从 15 世纪中叶欧洲活字印刷术的出现到 18 世纪法国大革命之前，印刷媒介在西欧的发展历史。印刷媒介这近三个半世纪的发展期恰是西欧近代史的序幕阶段。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虽然是在 17 世纪发生的，但作者拟将它和法国大革命一起纳入“印刷媒介和早期资产阶级革命”这一新课题，并辟专文论述。19 世纪，随着近代工业社会的兴起，印刷媒介成为真正的“大众传播媒介”，在 20 世纪电子媒介出现之前荣极至尊。该阶段也将是作者有关传播媒介和近代社会发展较大研究计划中的一个重要部分。